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將從明年2月號起，整合原「百年中國與世界」、「人文天地」、「政治與法律」和「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併為「研究論文」欄目。

——編者

沒有互信就無所謂「政改」

中國已然處於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茲事體大，決策之難可想而知。或許正因為具有高度的挑戰性，執政當局一直未實質性地啟動政改，事實上甚至迴避政改這個緊迫議題。

執政當局在政改問題上消極被動乃是世界通例，並不新鮮。環諸全球，政改的第一推動力往往來自民間，少有執政者自覺主動地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換言之，人民在政改問題上形成共識，並積極創造各種條件和契機去倒逼執政當局啟動政改，堪稱是各國政改之基本規律。那中國人民在政改問題上達成共識了麼？

張千帆的〈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告訴我們，關於政改，人民的共識不多、分歧不

少。首先，民間劃分為左、右兩翼；其次，它們中間又四分五裂、派別林立，彼此之間的調和難度幾乎不亞於左右兩翼之間的協調難度。何以如此？總體而言，民間與政府互不相信，精英與人民互不信任，深陷社會信任危機而難以自拔，此誠民間政改共識難以達成的一個重要內因。社會信任危機堪稱是中國政改的魔咒，啟動政改的前提條件是打破此等魔咒。唯有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精英與民眾之間彼此建立起基本的信任關係，有關政改的共識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啟動政改的日子才會為期不遠。

張文認為，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基本分歧在於民主與自由誰先誰後，並指出民主與自由不是對手而是朋友，「自由派」與「民主派」聯手才是中國政改的希望所在。竊以為，張文太樂觀了。在互信匱乏的社會，政改之啟動、憲政之建立談何容易。在直面互信已然成為奢侈品的慘淡現狀，首要的，是人民在心靈深處樹立對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信仰，通過信仰之橋到達互信的彼岸，然後才能共商政改與憲政之大計。

劉練軍 杭州

2012.6.28

《八二憲法》：憲政演化還是被動確認？

高全喜、田飛龍的〈《八二憲法》與現代中國憲政的演進〉（《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的諸多觀點有待商榷。

首先，該文拔高了《八二憲法》的政治功效，認為《八二憲法》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根本制度基礎，並且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和開放的政治空間，否則，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國的世界地位不可想像。《八二憲法》是否具有如此根本性作用？改革開放的根本制度基礎是甚麼？政治前提是甚麼？開放的政治空間究竟是何含義？實際上，改革開放能夠推行以及取得巨大成就，很難說得力於《八二憲法》的奠基作用，而是得益於政治強人鄧小平的推動，以及堅持了其所強調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發展是硬道理」，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至今也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其次，該文過高預估了《八二憲法》對於中國憲政演化的價值，認為《八二憲法》具有改革性、創新性，尤其是四個修正案體現了中國憲政演化的共和主脈和整體走向。《八二憲法》是否具有如此使命？這裏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這四個修正案是怎麼來的？到底如何評價這四個修正案？其實，這些修正案只不過是政黨執政邏輯變遷、黨代會精神在憲法上的反映而已，根本就不憲法自身演化的邏輯。如果硬要將此說成是憲法自身演化

的邏輯，進而上升到中國憲政演化的共和主脈，難免有些牽強附會。

再次，該文也過份誇大了《八二憲法》對於未來憲制發展的意義，認為《八二憲法》不僅對於完善國內憲政體制的結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礎，而且認為其為兩岸四地的政治統一和憲制成熟提供了較為堅實的實踐基礎。從未來的憲制發展來說，是否可以作如此期待？在一個政黨國家的框架之內，無論是憲法的修改，還是政治結構的變遷，起主導作用的都是長期執政的政黨。憲法只不過起着確認其精神與意旨的作用而已。因此，它是被動回應，而非主動改革。

阮思余 廣州
2012.7.2

〈差序政府信任〉簡評

李連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的分析與論證，在以下四方面尚存在值得商榷與改進之處：

第一，沒有分析政體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與互動關係。作者在篇首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二分法，即「政府信任」／「政體信任」，但以政體信任較為抽象和不確定為由，在研究方法上予以排除，從而專心於從政治科學的定量分析角度研究「政府信任」問題。這種方法論設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卻可能使作者的分析出現結構性

的缺失，比如不重視政體信任所依賴的政治文化與憲政制度的「深層」影響，忽略政體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合法性」供給關係，忽視政治哲學方法對政治科學方法的背景性矯正意義。

第二，對中國政治多元性的簡單化處理。作者之研究樣本與分析主要針對大陸地區，這樣的研究設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沒有將回歸之後的港澳居民的政府信任問題納入分析框架，也沒有對大陸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府信任類型做出有意義的理論區分，因此其研究結論大體只能說明大陸漢族地區的基本狀況，而無法說明主權意義上的中國的整體狀況。

第三，沒有對差序政府信任的演化趨勢提出富有政策意義的建議或進行規範性的框架式說明，也未對大陸從民主與法治兩個路徑建立「全面政府信任」的最新努力給出合理評價。

第四，對於差序政府信任的比較狀況未作適當交代，比如發達國家是否存在差序政府信任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如何？這些背景因素是理解大陸狀況的必要參照。

總之，該文在方法與論證上頗有啟發意義，但其研究設計與資料更新也還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間。

田飛龍 北京
2012.7.2

「農門」的疑慮

秋風（姚中秋）的〈論憲法之中國性〉（《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認為現行憲法無

法達至「優良治理秩序」，因為它缺乏「中國性」。作者提出不少理由來論證憲法應具有「中國性」，給出的良藥是用「道統」替換「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改變憲法架構。

這實在是用心良苦，對現行憲法而言無疑又是釜底抽薪。但問題是，該「道統」實為儒家的言說體系，不論如何中西比附還是西中比附，經過此前若干世紀之檢驗，其效果如何，歷史已有公論。即使該「道統」得以創造性地重建，但作為一個體系（而非其中的技術性言辭），那些標誌其特點的內容如何與彰顯現代文明的人類「共識」得以共存，仍然是其面臨的首要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列舉的「具體呈現中國性」的幾個方面也大有問題。比如，對存在諸多問題的憲法語言而言（儘管這在〔法〕學界已是共識），是否多幾個「之」、「者」、「其」就能體現「中國性」？刪掉若干「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顯得莊重？或許，不去修改而是通過憲法解釋，尤其是如何在生活中有效地運行它、激活它，才是當下最為重要和迫切的，才能真正樹立憲法的權威。

郭輝 北京
2012.7.3

威權主義是民主之母？

嚴泉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運動（1945-1948）〉（《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以國民政府憲政運動為線索，提出國民黨政權雖因內戰失利敗走台灣，但卻由威權主義向民

主轉型。1946年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憲法(即今日台灣實施的憲法)。嚴文的解讀是：「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選擇漸進式民主化的道路，『威權民主』作為一種政治自由化現象，確實有利於向自由民主政體的過渡。」

威權主義是民主之母還是民主之敵？這在政治學和政治史的學術研究領域都是一個能引發熱烈爭議的話題。嚴文肯定了威權主義在政治自由化上的積極意義，即威權主義也有「威權民主」的一面，並指出恰恰因為國民黨威權不足而造成民主化的失敗。其五點憲草修改原則、國共和談衝突和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逼迫蔣介石東北停戰等，都是威權不足表現。前者造成國共關係破裂，走向內戰；後者導致國民黨內戰失敗，徹底葬送民主轉型。文章還有一個正面例證：在排除中共、民盟掣肘的同時，處於強勢的國民黨最終做出妥協，通過1947年憲法，邁出了民主化轉型的關鍵一步。正如文中所說，「政治妥協不可能在國共雙方勢均力敵時發生，只有一方在徹底獲得武力優勢後願意重啟和談……」

嚴文將威權主義視為一條走向民主的可行近路。國共和談的破裂不僅造成了「統一」壓過「轉型」，更嚴重的是，威權統治民主轉型的模式也被徹底打破——國民黨在形式上破壞了國共和談，給了中共退出威權主義的契機。民主化轉型伴隨着威權主義的崩潰而完全停止。

趙玉成 上海
2012.7.10

悼念謝生謝太

今年5月下旬我和觀濤到香港參加編輯室會議期間，因為要騰出辦公室來，一直忙於整理和搬運書籍、雜物，所以沒時間和往常那樣約同事們聚餐，也就沒有機會聽到曾經為刊物工作過的那許多朋友的近況。6月5日離港，十天後突然收到張素芬的電郵，說謝國治先生和他的太太已經在14、16兩日相繼病逝了，令我驚愕不已，難以置信。

《二十一世紀》在1990年創刊，謝生的傳真廣告印刷公司中標印製本刊。10月上旬我看了大樣，決定大改版式；陳方正主意多多，又要加印宣傳單張、紀念卡、邀請信；觀濤對顏色、裝幀更諸多挑剔。雖然時間緊，要求嚴，謝生二話不說，加班趕製，使刊物在10月底順利面世。這樣，就開始了我們和謝生長達十餘年的愉快合作。記得有一天晚上，吳江波和素芬帶我到傳真公司，我第一次看到謝生和下班後來幫忙的謝太一起安靜地忙碌工作，完全不像我想像中的香港老闆、老闆娘，自此也跟着習慣叫他們謝生、謝太，大家成為親切朋友。每逢刊物舉辦紀念活動，謝生謝太都當作自家事，迎賓拍照，默默照應。除了刊物外，傳真公司還承印了我們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二三十種書籍。

到了2002年，《二十一世紀》轉由另一家公司承印，但編輯室同仁與謝生謝太友情持續。2004年謝生患上嚴重肝病，謝太辭去護士的工作，安排好員工轉職，把公司賣盤給別人，然後專心照料謝生。不料禍不單行，去年年初謝太患上晚期癌症。今年春節，素芬還與謝生謝太相聚，當時他們外表看來還不錯。誰能夠料到，不到半年後，這對敬業樂業的恩愛夫妻，就在同年同月的幾乎同一天去世了。天妒之還是天惜之？恐怕兩者兼而有之吧！

每一項文化事業，每一種書刊，除了讀者見到名字的作者、編者以外，總還有不少為之付出心血與年華的幕後功臣，如謝生謝太。至今許多同事仍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親切友善、斯文彬彬，和默默苦幹的敬業精神。

劉青峰

2012年6月22日端午前夕